



美国研究丛书
孙哲 主编

CONGRESSIONAL
POLITICS AND THE U.S.
ECONOMIC POLICY
TOWARDS CHINA

国会政治与 美国对华经贸决策

孙哲 李巍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国研究丛书 孙哲 主编

CONGRESSIONAL
POLITICS AND THE U.S.
ECONOMIC POLICY
TOWARDS CHINA

国会政治与 美国对华经贸决策

孙哲 李巍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孙哲,李巍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美国研究丛书/孙哲主编)
ISBN 978-7-208-07857-4

I. 国... II. ①孙...②李... III. ①议会制—研究—美国
②对外经济关系:中美关系—研究 IV. D771.223 F125.5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6889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美国研究丛书 ·

孙 哲 主 编

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

孙 哲 李 巍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8.75 插页 4 字数 649,000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50

ISBN 978-7-208-07857-4/D·1379

定价 58.00 元

自序

二百多年前,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中国,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商业轰动。那次航行的成功,使美国民众不仅见识到了来自遥远东方国度的上等新茶、精美瓷器、各式绸缎、象牙雕刻和漆器、桂皮、胡椒、食糖等商品,而且让新兴的美国开始对古老的中国着迷。^①美国开国之父华盛顿就是中国货的一个热心买家。他在1785年8月17日给朋友的信中,甚至提出了一份采购中国物品的清单,要求朋友代购中国南京产的条石桌子,中国夜餐茶杯和茶碟,蓝白色中国瓷盘,上等熙春茶,上等丝绸和最好的南京本色布等货物。^②创建了一个伟大国家的伟大政治人物华盛顿,竟是一个很懂品味、很追时尚的“居家男人”,并且迷恋中国货,这多少让人有所感叹。

更让人感慨的是,二百多年过去了,今天的美国人无时无刻不被中国商品所包围,同时,在中国也处处可见美国产品的影子。笔者看到一幅漫画:一面舒展飘扬的美国国旗,右下角竟然绣着一行英文小字: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这幅漫画尽管有些夸张,却说明中美两国虽然各自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历史变化和国家政治变革的洗礼,但其相互交往,不知不觉达到了彼此“相知愈深、苛之愈切”的崭新境界。

1. 大洋两岸的美国和中国

美国和中国,中间横亘着广阔的太平洋。二百多年来,两国相互打量,相互交手,也相互合作。

对中国而言,美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家,也是一个难缠的对手。美国这个国家年纪轻轻却少年老成,某种程度上还不能控制自己的“暴烈情绪”。它时而彰显自己的“正义”,充满改造世界的理想和雄心;时而慷慨大方,颇有“千金散尽”的豪气;时而工于心计,锱铢必较,充满实用自私的狡猾。美国堪称是一个有点良心但又行事霸道的“新罗马帝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国的天性,美国人敢于冒险、善于经商,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美国

① 奥斯卡·阿姆斯特朗:《两百年贸易的开端》,载于《交流》1983年第2期,转引自梁碧莹:《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② John C. Fitzpatrick ed., *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Washington, 1939, Vol. 28, p. 223.

人那样在工商业上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商业成为美国崛起和积累财富的“最有效和最丰富的来源”。^①也许正是财富或者说对财富的追求造就了美国企图征服世界的雄心和美国民主政治背后无法根除的“金钱至上”的本性。

也许有人会说,在中华民族崛起复兴的进途中,不期遭遇这样一个蛮横霸道又精明强悍的对手,实在是一种梦魇。但也有人把强大美国的存在,看成是上苍赐予我们的一个强有力的伙伴,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强大的美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一个不可多得的领跑员和赶超目标。其实,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从来都被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结缠绕着。而美国对于中国,一直有种难以割舍的“马可波罗情结”,一种对中国某些东西的极度迷恋中掺杂着强烈的商业狂热和天真的“传教士心态”。这种矛盾心理使得不少当代美国人至今还被如何找到与中国的交往的恰当方式而困惑。

看看中美交往初期的一段历史:

美国在亚洲发现中国之后,立即意识到中国巨大的商业价值。在美国“早年的国外市场中,中国拥有一种魔力,只有很少的其他市场具有这种魔力”。^②当时的美国商人认为,中国的“行商在所有交易中,是笃守信用、忠实可靠的,他们遵守合约,慷慨大方”。^③具有魔力的中国市场和笃信大方的中国商人,却诱发了美国的贪婪之心和盗取之念。美国采取了一种类似其国内拓荒时代的“扩张式的、冒险式的、占有式的态度”来侵入中国市场。^④但是,迫于自己实力尚不够强大,美国的冒险家们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玩起了“两面下注”的政治游戏。

这种外交手段的具体表现是,美国打着“和平”的旗号,利用自己的“中立”地位,在鸦片战争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左右逢源、两面取利。在战争中,美国虽然没有直接支持英国对华参战,却听任英国炮舰凌辱中国,等到英国通过战争获得在华特权后,美国顺理成章地变成了英国的“利益相关者”,理所当然地坐享其成;而对中国,美国表现温和,赢得了清政府的好感和“守法”、“恭顺”的好名声。由于清政府对“外夷”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凡不遵法度者“将其驱逐不准通商”,但“许恭顺之各洋先后开轮”。由此,清廷眼中“恭顺”的美国被予以特别嘉奖,被允许在广州正常通商。在华的美国人对他们当时的处境表示非常满意。他们说:“我们这些美国人现在和中国人相处得真是再好也没有。”^⑤

美国追随英国、借英国的实力达到自己目标的做法,狐假虎威、渔翁得利。而对清廷的示好,却又使美国显出“盗亦有道”的高明。例如《望厦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司法权、关税权、领海权等主权部分让与了美国这个“友邦”。可以说,美国非常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手段在华攫取利益并对华进行经济侵略。

今天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1/4 左右。近年来,中国正在成为举世瞩目的大市场和大工厂。伴随着“开发西部”和“振兴东北”战略的实施、长江三峡工程的

①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转引自赵一凡编译:《美国历史文献》,第 77 页。

② 中国科学院近代研究所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 1 卷,商务印书馆,1961 年,第 20 页。

③ 威廉·C. 亨特:《广州“番鬼”录》,冯树铁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9 页。

④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孙瑞芹、陈泽宪译,商务印书馆,1971 年,第 248 页。

⑤ 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真译,商务印书馆,1960 年,第 127 页。

加速兴建,以及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巨大工程的动工,中国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给世界带来了令人欣喜的振兴东风。从“美国梦”到“中国梦”,世界上不少人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的潜力和魅力。

记得我在上海接待美国克林顿政府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先生时,曾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我带他浏览了上海外滩美轮美奂的灯光夜景后,不忘补充“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论点。没想到,斯蒂格里茨先生当场反驳说:“在我看来,你们上海的实际收入差不多已经达到了1万美元的水平了。”我客气地解释道:“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因为你是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是我们的贵客,所以我们安排你住在豪华宾馆里,招待也特别优厚,其实上海还有很多普通市民为了节省电费,有空调却不舍得开,有洗衣机、烘干机却不舍得用。我们的真实收入,说得高点,最多也就是三千美金左右吧。”但他继续争辩说:“正因为我是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我知道怎么从实际生活的指标来看上海的发展水平。”他接着给我讲了一些他观察到的细节:他去上海最高档的购物中心看什么人在那里消费,结果发现许多青年人买起奢侈品来毫不犹豫,出手大方;他去建筑工地,发现工人三五元人民币的午餐盒饭里竟然也是荤素搭配合理;他走在上海大街小巷的时候,还特别留意了身边救护车、救火车、警车出动的频率……最后,他得出结论:按购买力水平计算,上海人均至少在8000美元!

中国的实际发展水平有这么高吗?记得我去年去西部考察,一位省领导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我们这个省最好的发展战略可能就是不发展,因为要保护生态太难了。有关部门曾在三江源地区做过调查,挖一铁锹土只要几秒钟,但要恢复原来的植被状态,可能要十年。我驰车经过西北大草原的时候,真切地感受到这句话的痛。几小时的车程之内,我亲眼看到一座座在夏季本应山花烂漫的大山,竟然被金黄色的沙丘遮掩了半个山坡,形成了刺眼的半金半绿的特殊沙漠化景象。这种刺眼的心痛,让我感受到中国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点成绩就忘记全球图景和中美两国的各自位置;千万不能忘记,巨龙虽然已经起飞,但自己身体的沉重,却使它难以快速升腾。

今天,这两个国家如何相互交往?美国对中国发展的不理解,体现在它对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的困惑上。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推广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一个自由的政治体系,加上开放的经济、强大的金融和规范机制,配之以高效的法律和法规,才是高品质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按照这种逻辑推理,实现经济高增长的国家应该是在印度、巴西等那些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中国独特而成功的发展模式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什么样的榜样?中国不附加条件的外援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援原则相悖,它会不会“妨碍”美国在全球推广西方式民主、企图增加发展中国家政治透明度的努力?例如,在非洲地区,中国“贸易胜过透明度”的交往原则,深受一些非洲国家的欢迎。中国的经济外援不附加政治条件,这与美英政策相冲突,也使美国国会片面地认为中国在利用世界各地对美国的不满而开展“富有魅力的商业外交”,已经“悄然”侵蚀、撼动美国的海外利益。

中国的发展已经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内政,这使美国不得不进行某种“痛苦的心理

调节”,在接受中国的同时,美国也在试图为应对中国崛起而进行内政外交转型。美国心存深度忧虑,认为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如环境污染、人口膨胀、贫富不均、银行系统坏账等等,都会直接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在两国经济交往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已经有美国政客喊出了要对中国“经济扩张”也“打一场反恐怖的经济战争”的口号。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金融恐怖平衡”理论。他认为,冷战时期,美苏都拥有“确保相互毁灭”的大量核武器,所以为避免“同归于尽”,谁也不敢首先使用核武器,这种“核恐怖平衡”到今天发展成为一种“金融恐怖平衡”。中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大量买入美元资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美国避免美元崩盘的厄运。其最终的结果可能使美国经济危机得到缓解、消费者购买能力维持稳定。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购买美元资产的国家不再购买美元,美国和全球经济稳定便会受到极大的威胁,最终的结果是鱼死网破。虽然“金融恐怖平衡”理论恐怕过于夸张,但是它至少说明,在当今中美经贸关系形成一种初步相互依赖的格局之下,中美之间真的“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所以她们必须学会和谐共处。

2. 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国会与中美经贸关系?

许多人并不明白,自 1979 年以来,特别是 90 年代以后,美国国会怎么会有那么多“坏脾气”? 国会议员为什么老是要找中国的麻烦? 中国加入 WTO 之后,中美经贸关系已成为仅次于台湾问题的中美关系中的第二大挑战,为什么美国国会总要干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一意孤行地把经贸问题“政治化”?

美国国会浓缩着美国人政治理想主义和经济实用主义的混合体。经过多年的探索,我们终于明白,中美关系孕育着很多机遇,但其面临的种种挑战,又与美国国会有关。美国国会掌握着美国的国家钱袋,具有法定的贸易领导权力。不了解美国国会便不能理解中美经贸关系,不处理好与美国国会的关系,也就无法真正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从较早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到最近的人民币汇率争端,中美两国在贸易逆差、知识产权、市场开放、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了交锋和对话。每一次合作与冲突背后,都有国会“无形的手”在台前幕后挥舞。翻开美国贸易政策演进史,我们可以看到,国会山上曾经聚集过众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①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国会常自认为是政府中“最具活力、最能代表民意、也最能体现民主理念的部门”,它要“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利益和要求”,^②积极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国会常常自以为比行政部门更爱国,更能把握美国的方向。2007 年 2 月,美国商务部公布了 2006 年美国国际贸易状况,新当选的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Nancy Pelosi)便立刻给布什总统写信,敦促他尽快与中国官员磋商,为美国贸易政策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以解决“不能让人忍受”的逆差,从而支持美国的就业和工人的工资。

^① 需要说明的是,“国会山上聚集着贸易保护主义”这并不代表着国会的主流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详细参见 I. M. Destler, *American Trade Politics*,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5, p. 66。

^② 郝雨凡:《美国对华政策内幕》,台海出版社,1998 年,第 303 页。

国会扮演如此重要角色,我们必须全面理解国会中的贸易保护主义现象及其对中美经贸关系带来的诸多影响。有鉴于此,我们在本书的写作中确定了三个研究主题:

第一,美国对外经济决策体制如何?国会在美国对外经济决策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拥有哪些权力?它与行政部门、中间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观察到,在美国对外经济决策体制中,国会最主要的权力就是通过对外经济法案,除此之外,它还握有监督权、否决权、钱袋权力、忠告或支持主政者、预算审核等“大棒”。另外,它还具有一些非正式权力。因此,要研究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形成,就不能不研究国会。

第二,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言,国会是如何认知中国经济发展的?如何影响中美经贸关系?我们的观察是,国会在美国对华经贸决策过程中扮演着孕育者、倡议者、制定者、立法者等多种角色。在战略性政策方面,例如,在是否与中国进行交往这类问题上,国会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一直主张跟中国合作;在结构型政策上,即常态下之对外政策决策,国会考虑更多的是美国自身的利益,如国家赤字、选区利益、对美国知识产权及工作机会的保护等等,因此国会对中国颇多微词,甚至有时蛮不讲理;在应急型政策上,即面临突发事件的时候,如撞机事件、中国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对世界造成影响等问题上,国会对中国的要求则更为强硬。

第三,针对美国对华经贸决策体制和国会的作用,我们应该做怎样的分析和总结来应对挑战呢?我们认为,美国国会确实是中美关系的“麻烦制造者”,但也有可能成为两国关系的“助推器”。只要懂得美国国会运作的规律,我们便可有针对性地做国会的工作,加大与美国经济交往的力度,在加深了解的前提下从容应对挑战,继而赢得机遇。例如,在近年来的国会研究中,我们发现,美国议员虽然习惯从“非黑即白”的角度看世界,但在中国问题上却并非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看法是和中国发展的现实吻合的,因此值得深入分析。

举几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兰托斯先生与台湾关系密切,对中国人权状况也持强烈批评态度,但是他反对台湾“独立”,也反对对台军售。上次受邀来中国,他居然还肯定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他诚恳地表示:作为一个曾经的大学经济学教授,他认为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他“真诚”说自己想做中国的“诤友”,希望自己对中国在民主建设方面的批评有助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他对中国的感情,不是简单的“反华”两字就可以概括的。

在中美贸易问题上,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民主党重量级议员兰格尔有很大的发言权。兰格尔一向以敢说敢言而著称,并且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很不友好,曾多次批评中国政府和美国布什政府在贸易赤字、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的做法。但是仔细分析他的许多言论,我们竟发现他是积极主张与中国搞好经贸关系的。他认为,经济发展中的劳工权利、环境保护、人权等问题都非常重要,但是美国不能只批评中国,美国自己在保护穷人和有色人种方面也需要许多改进。为此,当其他议员把这些问题和中国经济挂钩时,兰格尔不断做这些议员的工作,要求他们不能背弃与中国保持经济交往的原则。

再看另外一个议员的立场吧。我曾接待过一个“反华议员”。他在2000年是否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国待遇时投了反对票,而且以后一直“表现不佳”。这样一个经常找中国麻烦的人来到上海后,竟然自己去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在对中国大学生正式演讲时,他一开始就感慨

他说自己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从纪念馆出来后,他看到周边“新天地”地区的变化,从而体会到了中国自我转型的艰巨性。他不断赞扬我们“十一五计划”中发展模式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政策。他的演讲真诚感人,充满了对中国的关怀。

这些例子使我常常思考:我们判断国会议员外交行为的标准是不是应该更全面一些?

华盛顿的夸夸其谈和傲慢无礼是每个人都讨厌的;但我们不能像罗克拉斯蒂那样,在自己的心中塑造出一张我们认为是“真理”的床,并以此来砍掉我们不喜欢的腿,或者刻意拉长他人的身体,过滤掉我们听不顺耳、看不顺眼的东西。

中美经贸关系是一种“互补型”的,而非竞争型、掠夺型的经济交往关系。我们早就明白,“商业才是美国的正事”(American business is business)。这几年在中美经贸关系的演变过程中,我们不断体会美国的国家个性和谈判风格,以一种“斗智斗勇不斗气”的姿态,来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平衡。当然,如何尽量避免使用“支票外交”,节约国民财力,争取做到“巧牵牛鼻”,使美国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常和我们争吵但关系不错、不时能给我们做点好事的朋友,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在本书中,我们并不着力于构建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或者罗列一些西方的理论模式,而是试图以较为丰富的历史事实,通过典型案例的形式来向读者展现一个建国后美国国会对于华经贸决策演进的全景路线图,让智慧的读者自己来判断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种种是非非。

3. 关于本书写作的一些说明

2000年仲夏,我有幸能回国服务,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持“美国国会”大型课题的研究和开发。转瞬间,七载已逝,新人辈出。在这七年里,我们先后举办了“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美国国会与两岸关系”等多次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十多部相关的学术著作,得到了国内外诸多机构和学者同仁的关爱。还记得2001年第一次召开研讨会时,我们有幸请到了国内一批出类拔萃的学者与会。前驻美公使、现任我国驻苏里南大使苏格博士、前中国驻美使馆国会组张克远公使、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周琪研究员、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许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李庆四博士等30多位学者聚集一堂,共同探讨美国国会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正是在这些学有专长的同仁们的鼓励下,我们欣喜地看到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迅速跟进,“美国国会研究”的参与者越来越多,之前中国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对美国国会要么完全漠视,要么“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了。

在过去七年里,复旦大学“美国国会”课题组的研究主要朝着两个方向拓展:一是围绕整个美国国会运作机制来展开,其主要成果包括:由我本人撰写的《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与非(丁孝文)撰写的《美国国会》、丁孝文博士的《走进国会山》、赵可金博士的《营造未来:美国国会游说的制度解析》和沈国麟博士的《镜头中的国会山》等一系列专著。二是围绕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来展开,这方面的代表成果有:信强的《“半自主国会”与台湾问题》、蒋晓燕和信强合著的《美国国会与美国对华安全决策》、由我牵头撰写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案例与分析》,以及由我主编的《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等等。就第二个方向而言,如果说现今的中美关系主要存在三个核心议题:安全问题、台湾问题和经贸问题,那么对于美国国会

如何在前两个议题中发挥作用,我们已经有了—些较为系统的研究。对于第三个议题,虽然已有相关成果发表,但出于种种原因,至今没有专著问世。我曾指导过的成帅华博士才华横溢,在复旦就读期间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甚至完成了一篇博士论文。我和他还共同发表了一些文章,也一直有心合作写一部相关著作。但后来,成帅华博士因为出国深造,我们合作的计划就不得不搁浅了。这个缺憾—直萦绕心中,让我难以释怀。现今,我和我目前正在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李巍合作完成的这本新著《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终于完稿,总算完成了这个心愿。随着本书的最终问世,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这个方向终于有了—个完整的阶段式总结。

就学术背景来说,我自己在经贸问题上的专业训练还是不够的。我本人生长在“毛泽东时代”,虽在青年时苦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经典经济学著作,但当时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际运作知之甚少。我接触这门知识,要感谢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教授。他在20世纪80年代访问复旦的时候,我有幸向他请教,开始听说“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专业。吉尔平教授最主要的一个观点是:国际政治系统和国际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基于自由市场之上的、对外开放和成功的国际经济有赖于稳定和友好的政治基础。^①延伸开来讲,中美稳定和友好的政治基础与双方的市场发展、对外开放和对国际经济的贡献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在美国求学期间,我恰好遇到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米尔纳教授(Helen Milner),以及对“民主和市场”等问题研究颇深的诸多大师。受他们的影响,我才开始深入了解这门学问。同时,在纽约多年,我也经历了从门外汉到熟知商业社会运作的巨大转变。美国这个残酷的经济社会迫使我“恶补了”自己欠缺的商业知识。更具戏剧性的是,后来在美国教书的时候,我还主讲了两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国家政治、中美关系等课程,逐渐对跨国公司、美国经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有了一些粗浅的研究。回国后,因为研究美国国会,我又开始较为深入、系统地探讨国会“钱袋的权力”及与中国有关的许多案例,期间还有幸得到周敦仁教授、金灿荣教授、胡国成教授等的指点和帮助。美国的一些老师和朋友如研究中国和美国政治的伯恩斯坦(Tom Bernstein)教授、黎安友(Andy Nathan)教授、瑟伯(James Thurber)教授、李侃如(Ken Lieberthal)教授、研究中美关系的哈丁教授(Harry Harding)、兰普顿教授(Mike Lampton)、从事中美关系实务的张之香(Julia Chang Bloch)大使、好友盖特曼(Dan Guttman)和何立强先生(John Holden)都给予了我很多指教。我在台湾的一些好朋友如关中先生、周阳山教授、李有成博士等,—直馈赠给我相关书籍。在他们的支持下,我陆续独立或合作发表了一些有关美国国会和中美经贸关系的文章。

就专业知识来讲,我的合作者李巍可谓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他在硕士阶段师从北京大学以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美国贸易政治”而闻名的年轻学者王勇博士。王勇老师是研究中美经贸关系多年的专家,为人谦逊,学术功底扎实。他对李巍的悉心培养和耐心教育,激发了李巍的学术激情。此外,李巍在北大还得到许多名师的“真传”,王缉思教授、袁明教授、王正毅教授、潘维教授、张小明教授等,都曾为他授课解惑。

① 罗伯特·吉尔平:《中文版前言》,《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页。

还记得2006年元旦刚过,李巍从北京专程赶到上海找到我,表示希望在我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看着他那张略带稚气的脸,我不禁问他为何要从“国际关系”研究转向“美国政治”研究。他说,在学习了数年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之后,他强烈地意识到,要真正深刻理解国际关系现实,离不开对国内政治的研究,而国际关系始终是大国关系,因此必须先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国内政治入手。鉴于国会政治是理解美国国内政治的一把关键性钥匙,他就“按图索骥”,自寻导师找到了我。初次见面,我就被他的这番“宏论”所打动,同时也为他的求学精神所感动。我明白他想通过嫁接“国际关系”与“美国政治”这两大政治学的子学科(subfield),从而构建一种“两翼起飞”的知识结构的苦心和雄心。后来,我又读到了别人转给我的一篇在网上流传甚广的《国关武林志》,更加了解了其个性之中的另一面。我非常乐见他今后能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美国政治制度”这两大领域纵横驰骋。为此,结合他的专业背景和个人兴趣,我帮他设计了“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博士研究项目。我觉得我有责任帮助他尽快脱颖而出,成长为新一代学术栋梁。

从入校以来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位很有天分的学生。如果不对他进行“跃进型”的培养,真的对不起学术界。我真诚地希望他能成长在北大,“开花”在复旦,今后“结果”在更广阔的学术天地之间。李巍进校后,经过对他的综合考察,我让他担任学术助理,根据他的学术兴趣来帮我整理一些尘封的经贸论述方面的旧稿。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先提出大致写作框架,然后开始部分内容的写作。李巍起初只是扮演“拾遗补缺”的角色,但后来焕发了巨大的热情,反而比我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心血。他经常独自一人在复旦美研中心416办公室里埋头读书、写作,从早到晚,为此不惜“错过”很多年轻人应该享受的生活的乐趣。写作的过程是痛苦而快乐的。西谚有云:人人都喜欢香肠的美味,却很少有人愿意看到它的制造过程。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们师生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并且配合默契。全书结构的安排、典型案例的选择、甚至语言风格的统一,都是我们反复讨论的结果。我们至少每周见面两次,共同商讨写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交换已完成的初稿,互相批评补充。有时我会在半夜收到他的邮件,读到他文字中跳动的思想,我也会“老夫聊发少年狂”,凌晨跟他“鸿雁传书”。这一过程也更加让我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乐趣。

2007年4月,为了本书的写作,我专门主办了“美国国会与中美经贸关系”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李巍担任了这次会议的助理,全面负责联系与协调来自国内外诸多学者。通过这样的历练,他在学识长进的同时,也增长了见识。只有这样,他才能在读书、写书的同时,学会读人、写人,为未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过去一年时间里,我看到他逐渐地从一位博士生向一名学者的角色转换,时刻感受到了“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快乐。

回国后在复旦工作的几年中,我一直努力以自己的学术服务来回馈母校对我的培养,虽然不敢有所懈怠,但仍然会有一种“哀吾生之须臾,羨长江之无穷”的复杂感受。庆幸的是,无论是在复旦,还是我现在工作的清华,我都遇到了一批优秀的年轻人,他们的努力和成绩每每让我产生一种思想之光薪火相传、学术之火后继有人的自豪感。他们这一代在“小荷”初露尖角之时便向人展示了自己的激情、才华和对人生、事业、爱情的勇敢追求和真诚热爱。因此,我常常觉得,与我主持召开的那些学术会议、发表的那些文章及出版的那些著作相比,这些我亲身雕

塑的活生生的“作品”更让我感到欣慰。这些年轻人必将成为中国未来社会各界的主力,有幸能和他们在一起生活、读书、谈笑,人生夫复何求?

此外,我非常感谢崔志楠、徐华明、方骏、陈娟、高明、周叶菁、龚捷、孙培迺等同学在最后阶段对文稿的校对和整理,她们的精细工作减少了书稿中不少的文字错误。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赵荔红,她为本书付出了重大的心血。

最后想说的是,本书是我们在高强度、高压力的状态下完成的,同时,由于我们对“美国对外经济决策机制”及“中美经贸关系”这两个领域还把握不深,本书的粗糙、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还敬请各位专家、学者及友人批评指正。我们的电子邮箱是:sunzhe66@hotmail.com; kindyleeway@gmail.com。

孙 哲

2007年6月10日于上海

编者的话

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的评论,热情洋溢地赞美了中美两国的友谊和共同的价值观:

“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着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

浩淼连天、碧波万顷的太平洋,早已把中美两国连接在一起;对民主与科学各自追求,又使这两个区别极大的国家都对世界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中美两国作为两大政治实体,近代以来有过许多恩恩怨怨,这是因为两国的政治传统、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架构、政治举措乃至政治语言、政治逻辑、政治色彩等等,都有很大的不同,不少方面甚至是截然对立的。中美政治之“对立统一”,曾有一度使得矛盾双方互为前提、互相制约、互相斗争得“天昏地暗”。但社会发展到了当代,中美两国人民的伟大智慧,正不断推动两国的交流与合作,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美国和世界各国带来光明与幸福。当然,目前两国之间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鸿沟之外,还横亘着台湾、贸易、国家形象等诸多“巨型水雷”。但是,中美两国的联系和依存不可能被任何力量嘎然切断,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更是源远流长,历久弥坚。

在这个时代里,中国的内政和对外工作向世人展示了一幅浓墨重彩、气势恢弘的和平发展的时代画卷。但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也向我们提出了很多实际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促成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而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也使美国感到非常困惑。目前,很多美国人感觉到,与中国的关系现在几乎是每一个美国国内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应对中国的发展,从军事到政治,从贸易到文化,美国国内开始了十分认真的针对中国的观念及体制上的变革。

美国的经验既可以提供中国现代化建设参考,其行为的不确定性也成为中国未来能否和平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从对美外交角度来看,如果只知己、不知彼,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美国的行为模式,更无法预测未来美国对华决策可能发生的“突变”。例如,同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的概念,由于双方所存在的“知觉”和“错误知觉”,对这个词的理解有很大分歧。在我们中国的传统道德中,盟友与伙伴是应当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而美国人在巩固其霸主地位之时,常常忘记了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反而显示出极为自私的国家特色。通观美国与其战略同盟者在过去多年来的合作经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早已习惯于倾其所能地压榨战略同盟者,特别擅长通过国会、媒体等不同机构来驾轻就熟地“制造摩擦”,“火中取栗”。说得不客气一点,我们

如果遵循自己的传统道德理念来与美国打交道,那么很有可能令美国得寸进尺,或使部分民众面对新摩擦的不断出现滋生仇美情绪,引发对我们自己政府外交能力的怀疑;或使我们不得不陷入某种为减少摩擦而牺牲自己利益换取和平发展时间的固定对美外交模式。我们不能不未雨绸缪,全力加大对美国的研究,以美为鉴,谋祖国富强之路。

研究美国,是因为美国是一个耐人回味的国家,从立国至今一直顽强地按照自己的国家发展逻辑在运转。早期的欧洲人在谈论美国的时候,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一不屑的眼神,把美国人看成是一群“缺乏涵养的暴发户”。而在许多国人眼中,美国也无法摆脱“美丽的帝国主义”、“有点良心的强盗”等诸如此类的形象,面对美国繁华、强大、辉煌的一面,我们内心不时警醒自己,去捕捉这个帝国的负面影子。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不能说没有犯过错误,但很少出现导致国家发生重大倒退的决策失误。相反,美国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机和活力,一路走来,而且还将一路走下去,即使面对防不胜防的国际恐怖主义袭击,也毫无调整自己国家逻辑的迹象。对于这样一个具有独特精神气质并且满怀激情地妄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推广到全世界的国家,任何其他国家和文明共同体都不得不对其高度关注。作为正在崛起的中国,研究美国是一项具有历史眼光的伟大事业。

研究美国,可以奠定我国美国学学科的基础,促进其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和繁荣。在全球化飞速跃进的时代,美国学应当努力寻求并确立自己独特的学术支点和多维的研究画面。美国学需要立足于对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和文明共同体独特逻辑的考察,探讨美国在建国两百多年时间里所取得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从中发现美国得以强盛的内在规律、美国当下面临的诸多挑战以及美国未来的走向。美国学更需要放宽考察视野,不仅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角度看美国,更要从美国自身看美国;既要有历史长时段的宏观研究,也要有具体案例的微观透视,力争从众多角度、层面和视角对美国进行立体考察,从而发现美国不同维度的丰富内涵。同时,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美国,可以帮助我们架起沟通两国的桥梁,消弥时而出现的误解,解决此灭彼生的矛盾,共襄和谐世界的建设。从学术角度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为祖国的强盛服务,是每一个负责任并有能力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组织编写了这套《美国研究丛书》。

在推动美国学研究的宏大规划中,出于学科发展和现实实践的需要,本丛书设想从美国政治与中美关系研究入手,计划逐步拓展到对美国的全方位探索,分批推出一些研究课题。《美国研究丛书》第一辑计划出版的学术著作有:

作为丛书长篇引言,本人拙作《美国学:中国对美国政治外交研究(1979—2006)》探索了美国学在中国的诞生和成长,为读者诸君提供了一条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的线索。通过展现和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美国的种种学术努力,笔者试图透过这面“中国镜子”,探究中国美国观中的激情与浪漫,缜密与豁达,民主与科学。而这面镜子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还原”美国的真实,从中看到我们自己民族的成长。

丛书首批入选之作是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的。

第一,如何真正把握美国作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国情和政情,了解其政府运作和社会结构的特点?

沈国麟博士的《控制沟通:美国政府的媒体宣传》从理论探索、结构考察、行为考察和制度考察这四个部分探讨了美国政府的宣传行为在整个宏观政治结构中所呈现出来的态势和受到的制约,并且从政治沟通机制的角度研究了宣传行为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作者认为,美国政府媒体宣传行为的背后反映了国家想要利用媒体来影响和控制社会,追求和维护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达到其对内和对外的政治目的。

美国政府控制沟通和引导媒体,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其政治产品,积极进行政治营销。目前作为博士候选人的张哲馨把美国著名政治营销学者布鲁斯·埃·纽曼的代表作《营销总统:选战中的政治营销》介绍给我国读者,使我们对美国政治选举中越来越多的营销现象以及政治家的营销理念有了大致的了解,实为中国的美国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今后,我们将陆续推出一系列相关著作,对美国的政治公关与政治营销实践,包括政治竞选技术和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等等,作出更为详尽的介绍和分析。

第二,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内政,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解美国国内政治的运动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华外交决策。内政决定外交,仍然适用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特别在涉及对华关系时,更是如此。以下两部著作都是从美国国内政治和国内社会的角度来研究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

孙哲和李巍合著的《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紧扣近年来不断升温的中美经贸问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对外经济决策机制及其独具特色的国会政治在其中的影响。如果把整个中美关系比作一个大棋局,许多不同种类的棋手都同时参与这场博弈,那么美国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却经常被忽略的关键棋手。本书全面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国会政治的发展对美国对华经贸决策的影响以及未来的演进方向,以方便中国读者、特别是决策者,理解美国国会在中美经贸关系中所产生的各种正负影响,便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在美国对华经贸政策调整和变化时,做出理性而正确的政策回应。

张春博士的《美国思想库和一个中国政策》从总体上考察了美国思想库的主要类型以及发展历程,择其大者进行细致研究,不仅介绍了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演变的三个历史阶段,而且深入分析了美国思想库在一个中国政策上的不同主张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的不同影响。

第三,中美两国本身都在经历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实践的巨大洗礼过程中,中国如何主动开展对美交往?如何在两国交往中获得更大的战略主动,巧牵牛鼻,以智取胜,谋求我们的国家利益最大化?以下两本著作分别从历史和实现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对美交往的一些重要问题。

台湾学者习贤德博士的《孙中山与美国》对中国现代伟人孙中山先生与美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全面探讨了中山先生一生与美国的交往及美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这部著作的手稿是笔者2005年在台访学期间偶然拜读到的,后经周阳山教授介绍,才辗转与作者取得了联

系,得到出版授权。因原文较长,笔者为适应大陆读者的需要,在得到授权的情况下亲自对原稿进行了修改和注释编辑。

外交非外事,外交需要大的战略和智慧。在过去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打交道的时候,我们最成功的经验是奉行“敢斗愿和”的原则,有理有据地争取了国家的最大利益。随着国力的增强,国际经贸往来的发展,我国对美外交总体工作的开展,迫切需要召纳新的熟知内政外交人才,迫切需要推出新的战略思路 and 新的“前瞻性外交”对策,迫切需要进行一些决策及工作体制方面的具体改革。

赵可金博士的《竞争中的对话——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研究》提出了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在传统外交不断受到新型外交(如经济外交、能源外交、文化外交等)冲击的情况下,赵博士不仅较为详细地考察了公共外交的表现和特征,而且针对中国对美交往,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建议和主张。如何在保留我们文化特色的同时,也能将我们想宣扬的信息传递给思维和价值观不同的美国和其他国家民众,获得他们的认同,以提升和巩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这也是我们常常思考并希望有机会为国家贡献心力和能力的一件事情。对此,这部著作可视为一种重要的努力。

笔者在美多年,感觉东西方文化各有特色,如中国人含蓄低调,而美国人却偏好直截了当。同样是馅饼,我们讲究内容,“包子有馅不在褶上”;美国人爱吃的比萨,却是将所有的东西都铺在上边,让人一目了然。同样是演说,中国领袖的演讲,行文简洁却内涵深刻,常常需要再三研习方能领悟一二;而美国听众大部分希望看到幽默风趣的讲故事高手,希望听领袖的演讲能像喝“可口可乐”那样,第一口就有刺激,清爽、简单而直白。

美国研究是一个无比宏大的课题。所有研究的背后,都具有强烈的中国价值关怀,有服务中国发展的欲求。我们从研究政治与外交关系入手,是因为中美政治关系引领着经贸、文化、教育、科技、体育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关系。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有些时候,其他关系也能给政治关系的改变提供重要的契机。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新中国成立以后,中美两国对抗了20多年,华沙谈判时断时续不时陷入僵局了无结果。举世之人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僵局竟是通过中国乒乓球队“乒乓外交”打破的。在中美交往的历史中,可以勾沉无数诸如此类故事。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中美政治关系,而且要研究中美经济、军事、文化、科技、体育、宗教、法制乃至心理、语言等等,这些学术努力都是促进中美交流的必需。因此,《美国研究丛书》计划逐步扩大作者队伍,不断拓展著作选题。同时,中美关系的促进与发展,决非中国单方面的事,也决非中国单方面努力所能成就的伟业。因此,本丛书不仅包括本国学者的著作,也包括外国学者的译著。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还要将这套丛书逐一介绍给美国同仁,介绍给全世界各国的朋友。

丛书的策划是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启动的,后期的编撰则是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完成的。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复旦大学对我的培养和清华大学对我工作的支持。

感谢杨泰俊先生、上海人民出版社李伟国总编辑和赵荔红主任。杨泰俊先生的鼓励和引

见,李伟国总编的支持和安排,赵荔红主任的认真和协调,都是这套丛书得以问世的关键。

蝇头小字,却绵绵亘亘、不绝如缕地为文化与历史的传承,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书海沧桑,当龙腾虎跃、伟力万钧地为中美与世界的进步,再奉上熠熠生辉的智慧光芒。

蓝天作纸凭勾画,凌云健笔任纵横,我们欢迎每一个关心中美关系发展、致力和谐世界建设而又有决心与能力的专家朋友,加入丛书作者的队伍,为共同的事业携手并进;言为抒情婴鸣意,文以会友无惮多,我们也欢迎每一个关心中美关系发展、致力和谐世界建设而又有余力和激情的朋友,进入丛书读者的队伍,互激互励、互动互补,为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和人类共同文明的建设共同携手,为和谐世界的建设奉献绵薄之力。

孙 哲

2007年9月10日

于北京清华园